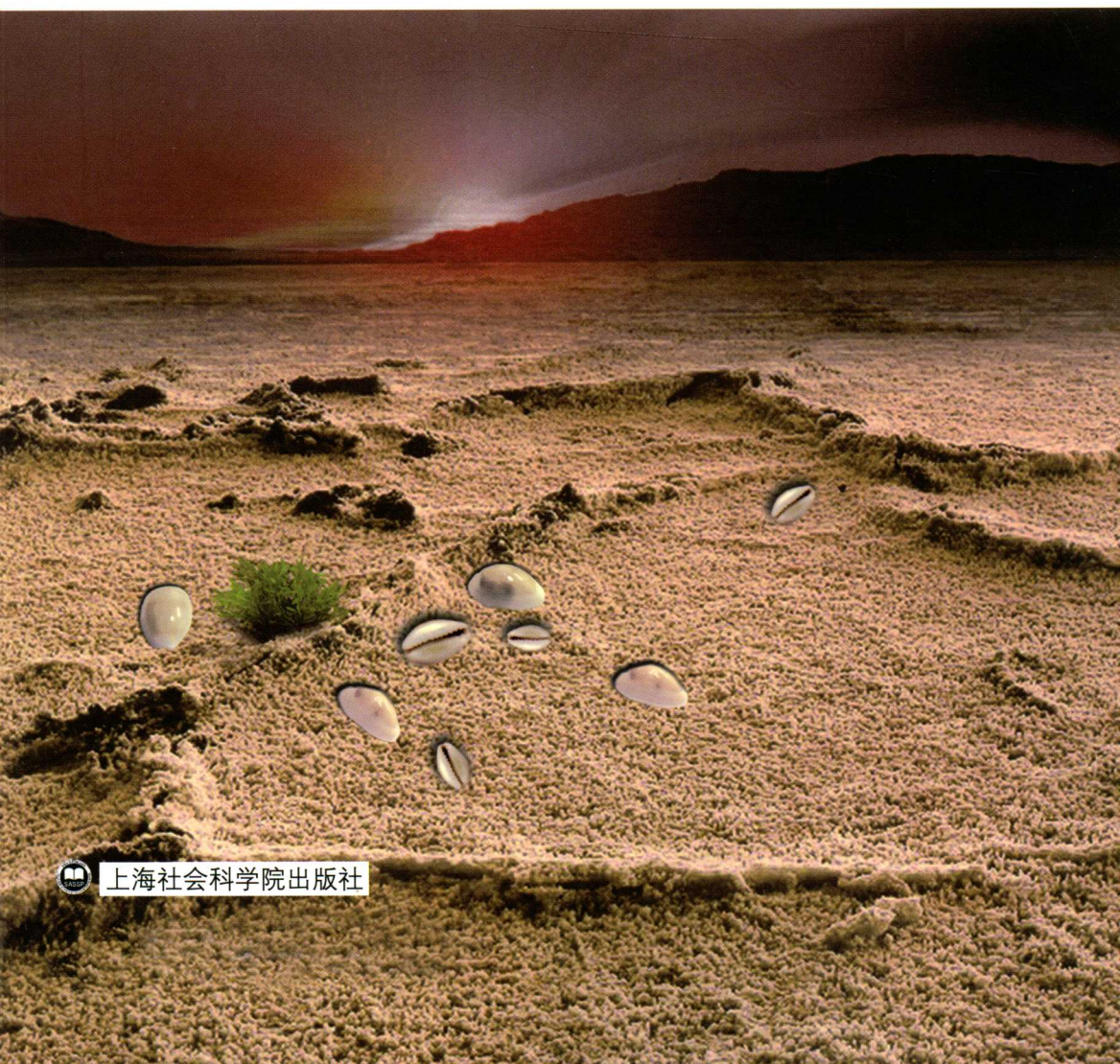


施云江 · 著
范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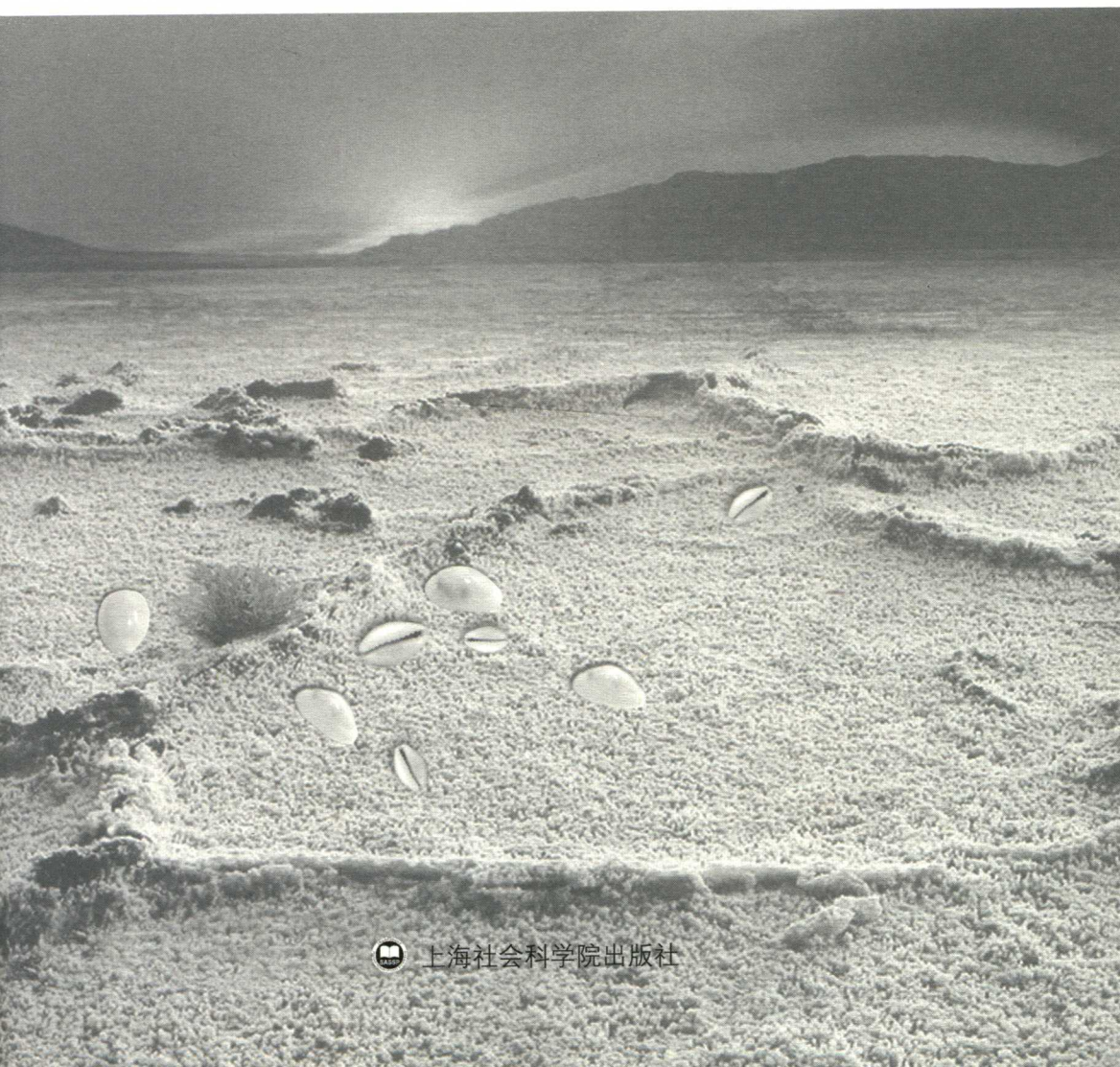
奉贤与货币起源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施云江 · 著
范 娜

奉贤与货币起源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奉贤与货币起源/施云江,范娜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

ISBN 978-7-5520-0771-8

I. ①奉… II. ①施… ②范… III. ①古钱(考古)—奉贤区 IV. ①K87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3866号

奉贤与货币起源

作 者: 施云江 范 娜

责任编辑: 陈 军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开

印 张: 20.25

插 页: 2

字 数: 310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0771-8/K·267

定价: 7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世界最早货币起源于 今天一个叫“奉贤”^①的地方

人类最早的理性,引导了最早的货币起源。

4 000 多年前,“典龙”奉贤创新,策动货币起源,并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采贝文明”,人类从此开启了信用公共化的大门,也让人类进入了一个数字计量关系的社会。本书所阐述的货币发源地也正是基于“典龙”这个货币创新发明人而来。

如果把人性的倾向作为一种理解历史的基准角度,则有可能让遥远而模糊的历史清晰起来。

中国货币起源,虽然来自社会发展关系中对信用的认识,但又是对海贝特征的应用发现。而将社会发展关系与海贝的应用特征关联起来的行动,则应该是一种发明了,因为货币是一种针对人类社会关系中最为核心需求的发明。

这是一项远早于中国四大发明的大发明。之所以要把中国远古用“贝”为币看作是一项发明,是因为币用之“贝”要从千百种海贝中选出一种来,是完全依赖于一种全新的创新意识,而且币用之“贝”是经过刻意加工的。同时,货币从“计数”起步,还是从“计量”起步,这里涉及了一个实际使用的效率问题。为此,我们更愿意把这个旷世之举归入到大发明的行列。

货币仍是迄今为止人类走向和平发展的坚定使者。而中华文明最早由此起步能说明什么呢?

① 奉贤在清雍正四年(1726年)正式置县。

人类货币的发源地——奉贤

——货币起源的探讨

Nr.1 Kaurischnecken, China (德文)

China 2000-1000BC (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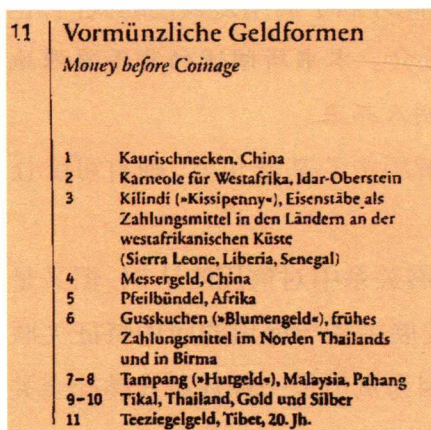


图1 德国柏林古钱币博物馆
关于货币起源的世界排名：中国海贝排
第一。

图2 德国柏林古钱币博物馆
世界最早货币排序展示



遥远的历史述说更远的未来。

如果把幸福快乐作为人类共同理想追求时，主政者可能会更易看清民意的方向，精英们或许会心平气和地放弃武力，也可能会避免教派冲突以及意识形态的对立而选择“包容与创新”。

一个大规模的文明体，在千万种人类关系中，要敏锐而精确地在6800年前选择“包容与创新”，并且用非文字形式表达出来，这可真是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灵感性想象。

人类从野蛮中走来，因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由“包容与创新”的理性引导选择了货币。

从人类发明效用看：货币已成为人类各种形式创新的媒介。

人类有了货币，则提供了更多的创新，让幸福与快乐脱离你死我活的争夺。创新让人类打开更大的资源空间。人类可以从持续创新中获得更多生存空间与财富，从而走向共同幸福的彼岸。

全球化终将冲垮教派分歧与瓦解意识形态的对立。全球化是人类幸福的全球化。

中国源头文明引导了中国货币的起源。

在中国，货币开始被认为是一种“信用”物而出现的。货币，本质上是带着和平的愿望起源的。

货币对生产力具有的天然号召力，有力地在推动着社会要素的不断增长而让人类向前发展。

历史是可以回归真实的。
只是认识与手段还在进化之中。

一个选用天然海贝当做货币使用的行为
却包含着一段人类历史的艰难。

海贝作为人类货币起源的再认识，
实实在在地牵动着一个人类货币价值观的再造。

抓住历史的逻辑，才能看清未来的路径。

生产性服务业是一个新兴产业领域，
中国文化中的内需蠕动才是这一产业的未来指向。



序 言

正在创建的国际金融中心与中国古代货币(贝币)的产出地,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特征,居然在地理位置上重合了——重合于上海。《奉贤与货币起源》一书从历史考证的角度,将此告诉了每一位上海人和正在了解上海的人。此前我作为一个生于上海长在上海的人却并无所知。

本书的价值不只是告诉读者奉贤与货币起源的关系,更在于作者以奉贤地缘的“采贝文明”与上海变迁的史事为依托,展示这里的企业家们(如本书作者施云江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心愿,展示在“新常态”下勇于探索、转型发展、创新驱动的坚定信念,令人钦佩。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货币有四种类型:实物货币、代用货币、信用货币和电子货币;货币有五大功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存储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2007年版第11卷334页上对货币的解释:“货币是一种人们普遍接受作为经济交换手段的商品。它能表示价格和价值”。也许有人会解读成货币是以实物价值对等关系存在的。而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人类货币起源合理的时间秩序和内涵应该是:①以物易物,②以某一基准物易物(如大羊),③以“贝币”易物,④以石头或金属冶炼品加工成

“贝币”易物，⑤以后持续引发了货币形式多元化的创新，如金属，尤其是金、银等……这能不能算作是中国货币发源地奉贤的结论呢？”作者告诉我们：“贝币”易物是脱离了实物货币的对等关系，是一种信用货币；而未来公平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也应该以信用社会公共化为基础。

据我所知，施云江先生在20年企业领导岗位上始终如一地刻苦研读经济学、管理学知识，曾经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哈佛商学院就读。本书是他在中欧学院课程结束后写就的，可以说是对经济理论孜孜不倦、认真攻读、锐意进取、大胆探索的研究成果。企业家不仅要乐于创造物质财富，而且要敢于创造精神财富。施云江是一个不错的典范。

我十分愉快地为这本书作序。

朱睦明

2015年1月18日

* 作者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

前 言

说,货币发源地,是否应先问:货币是什么?有说,是万物的等价物,那么它依然是物或商品。而本书说的货币是万物的“信用等价物”,是一种真正脱离了商品的“商品”。

其次要问,货币的“发源地”应该要具备哪些要素?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汉君认为:货币的“发源地”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货币最早的实物供应地;第二,是货币发明人及所在地;第三,是货币最早的使用地。在认可这一论点的同时,我们认为,使用地还应满足另外两个条件:一是公认的大范围使用地。大禹的大规模使用贝币,促成了一个国家的起源,使用的范围应该是大的;二是长时间使用。夏朝前以及夏朝的用“贝”为币长达600多年,可能还有早期的商朝使用。这一海贝起源的货币使用年限确定是很长的。

如果把这三个要素合在一起叫货币发源地,那么奉贤占了其中的两个先发条件,即:最早货币供应地加最早发明人。这样,人类货币的发源地在广义上看应该叫“中国”;但是,从中国这个相对狭义范围来看,货币发源地似乎可以看作是“奉贤”的。因为,中国4000多年前,中原地区用海贝为币的“贝”,采自奉贤远古的海滩,而创新用“贝”为币的人,是一位叫“典龙”的奉贤偃傫人。同时,由此发起的奉贤“采贝文明”催生了上海人类文明的起源。

问题的由起

一串久远的问：大约10年前，我在北大哲学系读中国哲学课程时留存了一串疑问。即：中国是一个全球远古以来仅存的大文明古国。5 000多年文明史（传统说法）的延续，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维系呢？6 800年前的伏羲八卦与2 500年前的诸子百家争鸣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中国文明的蔓延如果不依靠武力，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中国文明为什么会如此长久地延续至今呢？中国文明机制是否是人类未来合适的普世机制？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制造产业的方向一直由西方需求引导。如今外需饱和了，而内需在犹豫。中国大量的外需产能要内转。这样，就有必要研究一下中国文化，以资寻求认识内需的机会，也便于响应这种由外转内的产业形势。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难以下手。能否就近找到一个探寻上述问题的突破口呢？助手范娜找出两个2 500年前奉贤的历史案例来讨论：一是子游讲学，奉贤也因此而得名。县志也有较详细记载；二是吴被越灭时的三女逃往奉贤的事件。这显然是两个一时间难以判明方向的案例。

经比较：我们就从“三女逃亡”下手，开始了探索之旅。

由一个漫无边界的历史事件出发，走下去自然是“玄”。

奉贤县志认为：三女逃往奉贤是偶然的。而本书是向着这一结论的相反方向起步的。即我们认为：三女逃往奉贤应该是一次有目的的投亲行为。

施云江

2013年11月20日

图3 问题的由起

人类货币,从奉贤起源?

一个确实没有一点压力的使命:上海市民营经济研究会希望的一个研究课题;

一个确实是十分偶然的话题:因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升级与转型的理解,出于要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竟促使我们对一个离奇而真实故事的再读;

一个看似平常的历史故事“三女逃亡”,却埋藏着“采贝文明”的大玄机;

一个地处中国万里海疆一隅的上海奉贤,竟然与“货币起源”绑在了一起;

一个货币起源的故事竟然想象将中国5 000年的文明史上溯至6 800年前;

一个站在6 800年历史高点上的中华源头文明,“包容与创新”这个一以贯之的价值观竟然是人类未来共同追求的理性。

中国有了货币,从此开始以“信用”的名义:号召生产力的发展,号召各行各业持续的创新,号召人类社会无限的包容,号召放弃武力并号召人类走向持续的和平。信用让人类获得货币发行的自由;而货币的自由,让人类获得了一种脱离其“自身价值”而实现交换的机会,让人类文明有了大规模放大的条件。

在人类文明的进化中,自财富私有开始,就进入了一段漫长的野蛮进化期。奴役与被奴役、剥削与被剥削、杀戮与被杀戮,武力或生物进化原则成为这一段文明现象的通行证。在人类千万年的野蛮生物进化中,人类从未找到一种可以放弃武力或霸道的社会进化方法。

6 800年前的人类文明在漫长的黑暗中探索。其中,也包括远古中国。

伏羲八卦的想象，开始让中国历史植入另一种人类理性文明的选择。

距今6 800年前^①，由今天中国甘肃天水的伏羲氏长期思考得出的“八卦双鱼图”所表达的理性（以下简称八卦图或双鱼图。其中的八卦似乎倾向于方法论，而位于八卦中心位置的双鱼图似乎是一种认识论的表达），开始引导中国转向另一种文明的进化，即：不靠武力，而靠“包容与创新”来实现人类的文明发展。

这种认识论与方法论高度结合的象形“理性”出现在中国中原地区，这也可能是：为什么中国的人类从中国西南地区起源（复旦大学DNA结论），而中国顶尖的社会文明则从中国中原地区起源的原因。

也正是这个原因，从此让中华文明沿着一条确定的轨道来到了今天，并将走向未来。

这也是中华文明历经磨难，数千年不亡、延续至今的原因。中国远古文明源自伏羲对人类发展形式的哲学指引。其双鱼图的形象表达引导了中原人民的文明方向，“八卦”则提出了具体的方法。象形图案也极有可能引导着中国象形文字的起源。

人类“货币”文明史表述了人类持续努力地化解战争走向和平的历史，也是凝聚不同教派观点、不同部落、不同民族力量的新的开始。国家在此力量的推动下起源了。

到了距今4 000多年前，当中华文明最早进入货币文明时，即：宣告了以往人类进化的逻辑被真正的改变（尽管当时可能没有仪式，只是在一片海滩上或一片丛林下）。这也宣告了伏羲对万物“共生共长”

^① 由上海复旦大学人类学教授李辉先生依据DNA鉴定结果而提出。历史主流学派认为伏羲生于8 000年前。本书取最新科技成果的说法。

哲学认识论的观点，在中国社会实践中提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台阶。人类终于可以凭借货币的发明进入了长期由武力维系的生物进化逻辑的另一种选择——社会创新进化的文明轨道。

今天，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中国远古用“贝”为币的“贝”，竟产自眼下上海市奉贤区远古的海岸线上（同时，为方便对由海贝作为货币的称呼，本书中我们将此海贝之币称作为“贝币”或“货贝”）。

奉贤，作为中国货币的起源地，究竟说明了什么？

中国货币在人类社会中的最早出现究竟又说明了什么？

中国货币的起源为什么是从“信用”公共化发起的？

货币是迄今为止激发人类社会整体进化力量的独一无二的公共工具。货币也是国之重器，治国之利器。它也是自古至今乃至未来世界国与国非武力竞争并最终左右乾坤之物。

在一个民族的文明史中，货币文明的崛起无疑代表了这个民族走进了另一种现代的文明。货币文明的最早崛起也无疑代表了其背后引导性理论的先进性。

人类货币文明主导着当今世界。

由货币引导的文明才是真正走向未来的文明。

今日中国，外需饱和了，而内需在犹豫。

中国外向产业要转型，传统产业要升级，文化必将成为这一转型与升级的内在动力。尤其是当内需力量凸显时，把握住中国文化的内在脉络，方能迎接到真正的中国内需。

充分挖掘中华文明史中的创新力量，用于冲击传统产业文化的边界，是本书研究的一个任务，也是人类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使命。

4 000多年前的中国中原（注：本书将秦统一前的中国地域范围称为中原或中原地区）用“贝”为币，使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也使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进入了货币文明的社会。

4 000多年前，中原用“贝”为币，是谁的创新想象成就了人类金融长河的开启？它的源头策动之主今天还能找到吗？

把天然海贝当做货币来使用起自何时？史料记载：起自夏朝（约前21世纪—约前16世纪）。

然而，中原没有海贝。而中原地区历史上大规模用“贝”为币的想象，并非来自天人感应。

4 000多年前的奉贤，在上海自然地域形成中，出现的一些与采贝、运贝有关的痕迹着实让人感到神奇。

从奉贤现存史料与考古痕迹中，我们看到了远古奉贤海岸与中原地区“采贝为币”的关联性。

如果上溯至中国4 000多年前的三皇五帝，在历史若隐若现的蛛丝马迹中，呈现出了帝舜及其奉贤助手“典龙”（可能原姓“水”，后被舜赐姓为“典”）创新货币的关联痕迹。

《中庸》记载中的舜“好问”，是在问谁呢？难道不是在问一位既是财物管理者，又与大海“贝壳”相关的人嘛？难道不是那位纳言官，“龙”吗？

孔子特别记录了这个问，究竟是在赞颂舜“好问”的美德，还是“问”到了什么特别神奇之物呢？相信孔子用书面记载的“问”，不会是一个随便的“问”。

“用中于民”，难道不是指将个位数的中间数“5”用于计数，而用“贝”于民吗？虽然孔子此问可能是想说明中庸之道仍是王道的学术

之问。而刚好，此问的内容是事关王道与民道的要害之道——货币之道，信用之道。

舜受禅为王以后，增设的职位中的“龙”，作为上通下达的“纳言”官，其职责中的取信于民，难道不是取信于用“贝”于民吗？

龙，作为纳言官，在帝舜新的职官体系中是一个排名无足轻重的官，为什么一再被孔子与司马迁所提起呢？纳言官“龙”会有什么样的惊异作为呢？

舜，儿时流浪，难道不是结识了滨海之地奉贤的患难之友典龙，才有了用“贝”为币的选择吗？

从奉贤与金山史料或考古发现中我们看到，舜禅让王位与大禹后，中原部落联盟主对滨海大规模的行动，难道不是大禹对海贝进行专业化采集、运输等有组织的活动吗？

大禹对海贝的采集，采取了如此果断、迅速而大规模的行动，其意何在呢？

从奉贤柘林、南桥、金汇沙冈至竹冈一线海岸，向南至浮山岛三岛之间，向北至颛桥、马桥处，显然，这是一条南北向的远古时代的采贝海岸线。

大禹派勇将颛雪率兵丁数千翻山越岭，穿越辽阔的九夷之地，来到荒凉的防风氏所辖的边缘之地，千里出征于天涯尽头浮山三岛处，筑起一座土城——宁海城（西周时称康城），那时海上无敌，究竟所为何事？

4 000 多年前，中原是一个以农垦为主的部落联盟，舍近求远，突然派兵来到一片遥远而荒凉的海滩边，难道是来征服一片无所作为的海洋吗？

一座前后不呼应的古城，孤立地建在远离中原部落首领管辖地

黄河流域的千里之外，被称为九夷之地的最远边疆，岂不是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匪夷所思？

难道这个做法不是假借“开疆拓土”之名，其实是为了在奉贤由南向北采贝之需吗？

从宁海城的最南端向北30公里海岸上出现的柘林镇、南桥镇（原江海镇），3500年前的考古遗址，难道不是一座座采贝与运贝的连城吗？南桥向北至马桥之间，未来还能找到新的考古采贝连城遗址吗？

约6000年前—4000年前之间，在钱塘江水不断冲刷下，浮山岛海岸逐渐塌陷；而同时，奉贤“沙冈”海岸线则一直向东扩张到了“竹冈”一线。这说明奉贤海岸线在浮山岛处处在钱塘江清水与长江沙浆水两边内河淡水的夹击之下，呈现出北涨南陷的演变状态。

海贝是生长在咸水中的。奉贤南侧是钱塘江淡水与海水的交界处，可能是海贝生长的临界点。在大规模采贝规划时，可能是颛雪将军刚好看到了这一点而选择此地为采贝的起点。或许，这个采贝起点是大禹的决定。帝舜时期粮食的大增产以及贝币的使用，让大禹联想到对财富管理与对社会控制并扩大政治影响力手段增强的需要。

4000年前，在长年给中原采贝、运贝的过程中，奉贤人中形成了一个使用特别语言的人群。在抵御大自然灾害以及穿越不同人群管辖地域的运输过程中，这些人的经络潜能不断被复杂的场景激发至极限，并在此极端环境下得到长期的生活巩固，从而形成了世界上最多元音的语言。奉贤“伤傣话”神奇地诞生并保留到了今天。

从史料痕迹中，我们看到：中原用“贝”为币的起源与帝舜流浪